

辛亥革命 与清末民初社会

饶怀民 著

中国近代史事论丛

中国古代为什么会有光辉灿烂的文明？中国近代为什么老是挨打？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何在？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，中国的仁人志士提出的种种救国方案为什么总是破产？



中華書局

中国近代史事论丛

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

饶怀民 著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/饶怀民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06

(中国近代史事论丛)

ISBN 7-101-05156-1

I. 辛… II. 饶… III. ①辛亥革命-文集②社会变迁-中国-近代-文集 IV. K257.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5069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|
| 书 名 | 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 |
| 著 者 | 饶怀民 |
| 丛 书 名 | 中国近代史事论丛 |
| 责任编辑 | 欧阳红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|
| 版 次 |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张 16 $\frac{3}{8}$ 插页 2 字数 360 千字 |
| 印 数 | 1-25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7-101-05156-1/K·2278 |
| 定 价 | 38.00 元 |
-

目 录

跋涉于山水之间(代前言)/1

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与反封建/7

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/26

论两湖志士在确立孙中山领袖地位中的作用/41

黄兴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/55

黄兴功过辨析/69

民主革命的宣传家

——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章士钊/82

胡元倓与明德学堂/106

试论《民报》时期汪精卫的民族主义思想/118

杨毓麟与辛亥革命/150

谭馥与保亚票事件/176

刘揆一与辛亥革命/189

论辛亥革命时期刘揆一的近代化思想

——以工商总长任内的经济改革为中心/216

辛亥革命时期发生在上海的都督风波

——李燮和与陈其美争都督辨/238

李燮和与筹安会/253

黎元洪委任李燮和为“长江下游招讨使”质疑/267

覃振传论/275

宋教仁血案及其政治风潮/292

读《石叟牌词》评谭人凤事功/305

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志士的舆论宣传/322

狂飙突起 震惊中外

——丙午萍浏醴起义始末/339

论萍浏醴起义的性质/365

萍浏醴起义史料的真伪问题

——与《萍浏醴会党起义檄文辨伪》一文商榷/381

“舍身此日吾何惜”“但期吾道不终孤”

——刘道一事略/403

试评萧克昌/410

姜守旦非欧阳笃初辨/427

辛亥革命前列强对湖南的经济渗透/433

华兴会与科学补习所同异论/450

试评清末湖南咨议局/463

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/476

2

会党与长沙抢米风潮/486

论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会党的特征/494

清末民初湖南秘密社会的分布及其发展趋势/508

后记/517

跋涉于山水之间(代前言)

人生在世,每一个人都在走着自己的路,各自都有独特的生存方式、生活方式。回忆我所走过的人生道路,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可以说是由来已久,且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从小就过着“石与居、鹿与游”的生活。然而,幸运的是,我家所依托的后山竟是风光旖旎的禹山,传说大禹治水时曾到过此地,为纪念大禹,禹山因此而得名。禹山之颠有禹王庙,庙前有一水井,一年四季,泉水长流,我的父辈就是喝禹山的泉水长大的。

历史的传说已不可考,而日军侵华的历史却令人记忆犹新。1942年,故土沦陷,日本侵略军抢占了禹山这一制高点,用暴力驱赶禹王庙里的道士,其中有一位不知姓名的道士宁死也不愿意离开禹王庙,日本强盗竟残忍地将他捆绑起来,罩于古钟之内,用木柴堆积在古钟周围焚烧,将其活活烤焦,然后,又将尸体丢弃在泉水井内。从此,就再也没有人去喝禹山的泉水了。

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,故乡的人们藏进了禹山脚下的丛林深处,那时,我出生还不及一个月。有一天,正当日本的飞机在禹

山上空盘旋时，母亲抱着我在丛林中“穿梭”，不慎在我稚嫩的脖子上扎了一根木刺，因而发出哇哇的哭声。为不至暴露目标、保护父老乡亲，母亲用手紧紧地捂住我的嘴，不让哭出声来。我几乎被窒息而死。长大后，每当母亲向我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，总是泪流满面，这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！嗣因禹山的泉水井被日本侵略军破坏，乡亲们只好到离禹山较远的东湖去取水，因此，从我懂事的时候起，就跟着大人一道到东湖去挑水，于是，一根扁担、两只木桶伴随着我走过童年。我的童年就这样跋涉于禹山与东湖之间，我记忆中的“历史”可以说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故乡这片神奇的热土上。

1957年，我有幸考入华容县第一中学，这所学校的前身为清乾隆二十五年创建的沱江书院。学校位于华容县城北，西倚沱江，背靠黄湖山，环境优美，这里汇聚了一批名优教师，是理想的读书“圣地”。在中学时代，我对历史的兴趣有增无减，特别是当历史老师讲述中国近代史时，中国遭受屈辱和蹂躏的历史在我脑海中经久难忘，在黄湖山麓、沱江之滨，我和同窗学友讨论最多的也还是历史。诸如中国古代为什么会有光辉灿烂的文明？中国近代为什么老是挨打？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何在？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、中国的仁人志士提出的种种救国方案为什么总是破产？这些问题总是萦绕在我的脑际，当时，令我这个懵懂少年百思不得其解。因此，如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，以史为鉴，给现实以指导，成为我人生的奋斗目标。于是，我渐渐萌生了想当一个历史学家

的愿望；为实现这一理想，我走过了一段坎坷、艰辛的人生之路，几乎耗尽了毕生的精力。

1963年，我顺利地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，来到珞珈山下、东湖之滨，在历史王国里忘情神游，武大图书馆成了我每日必去的地方，在这里我可以博览古今中外历史典籍，度过了人生道路上一段难忘的岁月。可是，好景不长，正当我憧憬着大学毕业后在历史研究领域一展身手的时候，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武汉大学很快陷入了“大批判”的漩涡，几乎每天都有批判所谓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大会召开，接着又是“造反派”与“保守派”之间无休止的“武斗”。我不愿意介入这种派性之争，更不愿意参与武斗，只好选择当了一名地地道道的“逍遥派”，每天奔波于图书馆、资料室，准备撰写毕业论文；可是，在“大字报”满天飞、“武斗”不断升级、人身安全尚且得不到保障的混乱状态下，谁还能静下心来写文章呢？1968年，我们年级30名毕业生便被“扫地出门”，派往农村、农场接受“再教育”，我被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。那时，军事训练极少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种植水稻、干繁重的农活；当时，农场机械化程度较低，仍需采用牛耕，因此，连队养了不少水牛，在分配劳动任务时，大家谁也不愿意去当“放牛娃”，而我却乐此不疲，因为这给我自学创造了极好的条件，便承担了养牛的“苦差”。每天清晨，我便到湖边湿地去放牛。我抓紧“牛背”上的时间学习专业和外语，以补偿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损失。通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，我的外语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从军垦农场出来，我又进过“五·七”

干校,下过农村,搞过生产培植,做过政工、公安工作,还当过理论教员,在基层一干就是10余年,但我仍然初衷不改,执著追求,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历史;特别是在岳阳市委党校担任理论教员的5年时间里,我将马克思、恩格斯关于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的论著以及列宁关于义和团运动、辛亥革命的论著通读了一遍,写下了1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,这使我的理论素养大有提高。

1978年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,迎来了科学的春天。1979年,我有幸考取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,师从章开沅先生,治辛亥革命史,成为章先生的“开门弟子”。在丹桂飘香的季节,我来到桂子山,在南湖湖畔开始我难忘的研究生学习生活。章先生亲自给我们讲授理论课和专业课,谆谆告诫我们:学习中国近代史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,必须花大气力搜集资料,必须要有稳定的研究方向,勤奋治学,务实求真,有一分耕耘,就会有一分收获。章先生的教诲,至今言犹在耳,使我终生受益。章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,章先生现已80高龄,仍笔耕不辍,他的言传身教成为鼓舞和鞭策我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。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生活可以说是我人生道路的转折、学术生涯的开端。值得一提的是,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,教育部在华师举办了高校讲师以上教师进修班,为期1年,聘请全国各地著名学者讲授中国近代史。先后来华师讲学的有戴逸先生、姚薇元先生、王庆成先生、胡滨先生、林增平先生等知名教授。我们这批研究生也和进修班的同行一道听取前辈学者的学术报告,受益匪浅。

加以当时章开沅先生和林增平先生合作主编的三卷本《辛亥革命史》正在统稿之中,因为编书的关系,林先生来华师的次数较多,从此,我有幸结识了林先生。林先生谦虚谨慎、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1981年底,林增平先生拟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筹备成立中国近代史研究室。正值青黄不接、人员缺乏之际,他征得章先生的同意,询问我想不想回湖南工作。作为一个湖南人,又能在林先生身边工作,这是我梦寐以求的,于是,我便爽快地答应了。翌年初,我很顺利地被分配到湖南师大历史系工作。来到岳麓山下、湘江之滨,林先生首先交给我一个光荣的任务,那就是协助他筹建中国近代史研究室。在林先生的具体领导和指导下,在历史系同仁的共同努力下,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终于得以成立。研究室成立后,我一面做研究工作,一面为研究室采购资料,并成为研究室第一任图书管理员。20多年过去了,通过几代人的努力,湖南师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现已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,这是可以告慰林先生于九泉的。

岳麓山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之一,山下的“千年学府”岳麓书院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;山上安葬着黄兴、蔡锷、陈天华、蒋翊武等50余名辛亥革命的著名英烈。坐落在湘江东岸的湖南第一师范曾经是一代伟人毛泽东求学的地方,依托岳麓山、湘江的长沙城曾是毛泽东早年从事过革命活动的地方。而湖南师大创建于1938年,历史悠久,学校图书馆、历史系资料室藏书丰富,我来到这里工作

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为不改初衷、不辱师命，我决心在这里“安营扎寨”，一辈子研究辛亥革命史不动摇。我深感耽误的时间太多，再不急起直追恐将一事无成。因此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，我在教学之余，积极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，几乎每两个月就要发表一篇学术论文。90年代以后，我虽然将主要精力用于培养辛亥革命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、硕士生，但仍然在中国近现代史这一领域辛勤耕耘。由于起步较晚，水平有限，尽管也出版过几本学术专著，但还是觉得不太成熟。然而，这毕竟是我个人的研究成果，反映了我在治学道路上艰难跋涉、“惨淡经营”、痛苦求索留下的足迹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回首往事，至今历历在目，含辛茹苦的父母，废寝忘食的恩师，患难与共的妻儿，同窗苦读的学友，他们都曾为我的成长付出过艰辛与汗水，作出过无私的奉献，我无以为报，谨以这些作品奉献给生养我的父母！献给培育我的恩师！献给朝夕相处的妻儿！献给支持过我的同窗、朋友！献给苍茫大地！献给名山秀水！

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与反封建

孙中山的一生是为中国近代化而斗争的一生，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家，他以无与伦比的勇气，率先揭橥批判的大旗，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全面的、系统的批判；同时，他作为革命活动家，又以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，对封建专制制度开展了武器的批判；在此基础上，他又经过详尽的调查、缜密的思考，制定了比较切合中国实际的近代化蓝图。因此，探讨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与反封建的关系、探索孙中山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内容、特点及其局限性，不仅对于研究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有积极意义；而且，对于我们今天深入开展思想战线上的斗争、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余毒、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是大有裨益的。

一

孙中山是中国最早提出以民权代替君权的革命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。他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批判是从阐述民权主义而发其端的。

孙中山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出发，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，即洪荒时代、神权时代、君权时代、民权时代。那么，君权时代怎样才能演变为民权时代呢？孙中山认为，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。由于“君主专制一天厉害一天，弄到人民不能忍受。到了这个时代，科学也一天发达一天，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一天，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。知道君主总揽大权，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，供他一个人的快乐，人民受苦他总不理睬。人

民到不能忍受的时候,便一天觉悟一天,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,人民应该要反抗,反抗就是革命”^①。毋庸讳言,孙中山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不科学的,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相距甚远,但他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,并大胆探索其发展规律却是值得重视的。他把由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,看成是一种“世界的潮流”,“无论是怎么样的都是阻止不住的”^②。在中国实行民权主义是符合世界潮流的,最终必然会取得胜利的。

需要说明的是,孙中山并非主张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,他在倡导民权的同时,也承认过去所谓“神权”、“君权”存在的合理性。在他看来,“从前人类的知识未开,赖有圣君贤相去引导,在那个时候君权是很有用的。君权没有发生以前,圣人以神道设教去维持社会,在那个时候神权也是很有用的”^③。因此,他认为神权和君权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,都曾在历史上起过某种进步作用,只是到了近代,神权和君权才成为“过去的陈迹”,成为历史发展的严重桎梏,社会要继续前进,就必须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。

值得重视的是,孙中山是从实现中国近代化的战略高度出发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,由于近代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,包括政治近代化、经济近代化、人的思想近代化,等等。所以孙中山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涉及范围极广,内容相当丰富,概括起来,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。

第一,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,提倡“政治革命”、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是实现近代化的前提。

①②③孙中山:《三民主义》,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九卷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260、267、261页。

首先是对君主的批判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,君主是封建专制的总代表,是一切罪恶的渊藪。“皇帝高高在上,便可以为所欲为”^①,中国的秦始皇就是这样的专制暴君。孙中山在分析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,指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极端专权,“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,专制到极点,好比中国秦始皇一样”^②。中国两千多年来,都是君主统治中国,皇帝与人民的关系一直是主奴关系,“只有皇帝一个人是主人,人民都是奴隶,人民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”^③。可以说,“在中国的四万万人,就做过了几千年的奴隶”^④。人民完全被排斥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,被剥夺了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。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,人民“惟有兢兢遵守而已”^⑤。官吏任免权完全操纵于皇帝之手,“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人的喜怒”^⑥,在皇帝的淫威之下,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分开的,人民虽然没有政治权利,但却有交纳赋税的义务,正如孙中山所说的,“政府与人民之交涉,只有收纳赋税之一事,如地主之于佃人”^⑦。就皇帝本身而言,其权力与能力也是极不一致的,孙中山认为,君主虽然权力很大,但是有能力、有道德的人却不多,“历代的皇帝,只有尧舜禹汤文武有很好的本领,很好的道德,其余都是没有本领、没有道德的多,那些皇帝,虽然没有本领,没有道德,但是很有权力的”^⑧。由于绝大多数皇帝有权力而无能力、又无道德,人民对皇帝的不满便与日俱增,为防止人民的反抗,君主便欺骗人

①②④⑧孙中山:《三民主义》,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九卷,第339、260、327、325页。

③ 孙中山:《在广州对东路讨贼军的演说》,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九卷,第569页。

⑤ 孙中山:《伦敦被难记》,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一卷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52页。

⑥ 孙中山:《在东京〈民报〉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》,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一卷,第330页。

⑦ 孙中山:《支那保全分割论》,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一卷,第220页。

民,“每每假造天意做他们的保障,说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是天所授与的,人民反对他们便是逆天”^①。他揭穿了这种“天子受命于天”的谎言,指出,“天下者;天下人之天下”,“非一二人所可独占”,在民权时代,天下人人皆可为皇帝,“这四万万人都是皇帝”^②。君主虽然没有多大能力治理国家,但对于保持自己的皇位却是特别注意的,皇帝除穷奢极欲地享乐之外,其主要精力便“是要保守他们自己的皇位,永远家天下,使他们子子孙孙可以万世安享。所以对于人民的行动,于皇位有危险的,便用很大的力量去惩治。故中国一个人造反,便连到诛九族,用这样严重的刑罚去禁止人民造反,其中用意,就是专制皇帝要求永远保守皇位”^③。孙中山对于“历代的皇帝都只顾皇位”、“不理民事”的世袭皇权表示极大的愤慨,他说,“除非有人把他推翻,才不能世袭,如果不被人推翻,代代总是世袭”^④。他号召人民起来用武力推翻这种长期统治中国的世袭皇权。

其次是对帝王思想的批判。由于封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,历史上不少所谓“豪杰之士”梦寐以求的便是如何登上皇帝的宝座。这恰恰是导致国内战争、人民互相残杀的根源。孙中山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,力陈帝王思想的危害,谆谆告诫国人,绝对不可有帝王思想存在。他说:自古以来,我们中国人“只知道立志要入学、中举、点状元、做宰相,并且还有要做皇帝的。譬如秦始皇出游的时候,刘邦、项羽都看见了,便各自叹气,表示自己的志愿。项羽说:‘彼可取而代之。’刘邦说:‘大丈夫当如是也。’他两人的口气虽然不同,但是他们的志愿,丝毫没有分别。换句话说,都

①③④孙中山:《三民主义》,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九卷,第285、275、288页。

② 孙中山:《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》,《孙中山全集》第十卷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461页。

是想做皇帝”^①。这种思想,代代相因,到了元朝,朱元璋“推翻元朝异族的政府,把政权拿到自己手内,改国号为明朝,还是自己做皇帝”^②。洪秀全也是如此,他失败的最大原因也“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”,“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,就互争皇帝,闭起城来自相残杀,第一是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。洪秀全既做皇帝,杨秀清也想做皇帝。”通过天京变乱,“太平天国的势力便由此大衰”^③。他得出结论:“凡是革命的人,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,就会弄到亡国。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,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,一定彼此相争,争不到手,宁可各据一方,定不相下,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,还没有定局。”^④孙中山反复提醒自己的战友和同志:“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,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,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。全国长年相争相打,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。”^⑤因此,“从前做皇帝的思想,是过去的陈迹,要根本的打破他”^⑥。为清除革命队伍内部的帝王思想,杜绝历史上“总是争皇帝”事变的重演,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制定的《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》中明确规定:“敢有帝制自为者,天下共击之!”^⑦俾与同志共同遵守。

复次是对腐败官僚政治的批判。在中国封建社会里,以皇帝为首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的官僚机构。至清代,这种官僚统系越来越臃肿,官衔越高,特权越大,大小官吏只知争权固宠,以致草菅人

① 孙中山:《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》,《孙中山全集》第八卷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536页。

② 孙中山:《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》,《孙中山全集》第八卷,第470页。

③⑤ 孙中山:《三民主义》,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九卷,第269、270页。

④ 孙中山:《在东京〈民报〉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》,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一卷,第326页。

⑥ 孙中山:《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》,《孙中山全集》第八卷,第538页。

⑦ 孙中山:《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》,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一卷,第297页。

命、贪脏枉法之事，所在多有。正如孙中山所揭露的，“有权有势之家，奔走效劳之辈，仅因为个人仇怨，就可以捏造罪名，把人抓到官府，要求惩治。被陷害的人，还是无法上诉，无人辩护，只得面聆诬控”^①。法律徒具空文，冤狱遍于国中，“其身为民牧者，操有审判之全权，人民身受冤抑，无所吁诉。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，上下相蒙相结，有利则各饱私囊，有害各委其责任。婪索之风已成习惯。官以财得，政以贿成”^②。由于官衔是用钱买来的，所以，清政府不可能要求法官依法办事，而是“任法吏之妄为，丝毫不加限制”^③。这样做的结果，往往使那些罪大恶极者逍遥法外，而使那些无辜良民难逃厄运。对此，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，“内自朝廷以至奄（阉）竖，外自督抚以至胥吏，皆以贪脏为能，以害民为事”^④。更有甚者，有的官吏还把制造冤案作为聚敛财富的一种手段。“地方官出而任职，首先查明富庶之家、献媚之徒与抗逆之人。其视为异己者，则强迫亲己者诬以罪名，逮捕入狱。”然后处以罚款或抄没家产以达到“将他人之物占为己有”的目的。这些人往往“以刑狱致富”^⑤，贪污贿赂成风是腐败官僚政治的重要表征。在清末社会，可以说无官不贪、无处不贪、无时不贪。孙中山举例说：“中国官界，每逢生日，其所属必集资以献。时两广官场以值李督生日，酿金至一百万两以充贺礼；此一百万两者，无非以诱吓兼施、笑啼并作之法，取资于部民之较富者。而同时督署中，又有出卖科第、私通关节之

① 孙中山：《第一次广州革命的起源》，陈旭麓、郝盛潮主编：《孙中山集外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4页。

② 孙中山：《伦敦被难记》，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一卷，第50—51页。

③ 孙中山：《对外宣言书》，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二卷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9页。

④ 孙中山：《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》，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一卷，第316页。

⑤ 孙中山：《第一次广州革命的起源》，《孙中山集外集》，第4页。